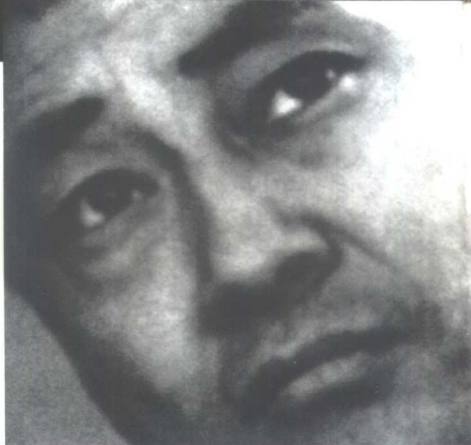




XINGUOJIA
ZHUYI DE JINGJIGUAN

思考 SiKao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何新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 何新

何新 / 著

时事出版社

何新访谈录(第二卷)

思 考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何 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 9

ISBN 7-80009-669-6

I. 思… II. 何… III. 经济理论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121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时事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5 字数：46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经济学箴言

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历史，通过理论或
通过统计数字。

——熊彼特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恰恰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

我确信，与思想的侵蚀作用相比，利益归属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错误的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在经济与政治的哲学领域，大多数人在 25—30 岁之后已不再接受最新理论的影响。公务员们、政治家们以及宣传鼓动者们对时事的看法，不可能都出自最新的思想。然而，或迟或早，对形成善良或丑恶的观念而言——更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利益的归属。

——凯恩斯

我们至少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社会主义——而不应该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怖名词。我们至少应读向资本主义挑战——而不应该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偶像。我们至少应该试探这两种体系的某种组合，使这种组合不会导致斯大林主义；但也不会导致那种牺牲多数人的机会，甚至是以生命作为代价而赢取少数人的惊人利润。

——[英] 亚历克·诺夫 (Alec Nove)

出版说明

《思考》“何新访谈录·第二卷”（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是根据访谈者与何新一系列访谈记录的综合所整理。本书提供了何新关于经济学理论、当代中国经济、国际经济及社会主义历史和改革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本书展示了何新对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独特、新颖的观点。

由于本书是在多次、多篇、异地、异时谈话记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因此有些论点难免有所重叠。而谈话录的问答形式，则难以建立一个连贯、严密的数学模型。本书只能提示一种研思及辩论的方向和路标，而不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何新希望以后会有机会另写一两部关于经济学史和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专著，以弥补这种缺陷和不足。

本书系何新先生本人提供原稿，而由黎明负责编辑和整理。理论方面的问题，何新本人负责。文字和编辑方面的问题，由黎明负责。

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理论要点

本书是何新关于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著作，何新在本书中阐述了一系列新颖重要的理论观点。

1

何新认为，人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即“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或“现代企业制度”，有严重的误解。根据法、德学者的看法，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所谓“莱茵模式”（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美模式）。

资本主义的这两种现代模式，都已与 19 世纪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两者都属于“混合经济”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都已不是单一私有制，单一自由市场的古典资本主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大型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形成实力雄厚的经济航母——跨国股份公司。

在投资形式上，“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主要依赖银行而非直接资本市场。国家通过宏观财政及货币政策对产业给予扶植和强有力的经济及政治支持，而不是让它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听任其死生。英美模式则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非银行。

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 20 世纪一切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在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

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非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于具有国家订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如“世界 500 强”一类）。

何新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2

何新认为，20 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 19 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还具有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

何新认为，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二战后的 50 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

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 90 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 1/2 到 2/3，占本国内生产总值 GNP 的 20%—30%。“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自 30 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何新认为，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所以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

西方资本主义在 17—19 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的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何新认为，中国左右两翼的理论家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缺乏全面和正确的研究和了解。

左派由于无知而误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认为它是所谓“欺骗”无产阶级的伪善。右派则有意忽视甚至掩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面，把当代资本主义宣传为单一私有化放任自由竞争的经济。

何新指出，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过去也已建立了这一保障体系。并且尽管经历了 90 年代的制度动变，这一体系在基本上并未废除，因此仍在发挥社会稳定阀的作用。这也是它们虽然引入了私有化和西方的多党制政治制度，国家却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原因所在。

3

何新认为，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过去毛泽东搞“赤脚医生”，其实质是试图在农村中提供一个廉价的卫生保健系统。而“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以集体经济向农民提供生存最低保障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过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这一保障系统，维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是，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这是当前社会不时发生局部动荡、社会犯罪率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讲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何新认为最重要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激烈的私有化运动或政治改革，之所以不能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之所以若引进这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中国必会陷入社会动乱，原因也就在此。

反之，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

何新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经验均表明，大量失业、无业人口的涌现，从来就是一个制度失败的表征，同时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源。

因此何新认为，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因为他们明知在中国意义上的私有化与西方及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具有根本性不同；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内安全系统存在。

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 18—19 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

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他们鼓吹政治人权，但却反对中国政府将对人权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确保人类生存第一权利，即经济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系统上，反而怂恿中国人“砸三铁”，从而破坏了原有的企业内（类似日本大企业那种）终身雇佣制的社会保障体制。

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4

在共产党执政下可不可以搞资本主义？应不应该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

何新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 20 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

在经历这一转变的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路线当时曾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左派指责列宁的“新经济”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倒退。

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前进和发展，是在俄国当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为提升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只能作出的必然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唯一选择。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上，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手段，而实现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的。

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 30 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5

何新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作邓小平、江泽民对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

列宁当时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 19 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何新认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

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

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各国在这一全球性竞争中的得失成败，不仅会决定具体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决定了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生存命运。

因此何新认为，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

6

何新认为，国家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

何新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考虑到中国所具有的综合国力已接近世界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若干实物生产方面已成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大国。中国已有条件也有必要及早考虑规划和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

何新指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三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依靠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福利体制”，即欧洲模式。一种是依靠社会保险基金及资金市场的英美模式。一种是依靠企业内部资金支持的“终身雇佣”制，即日本模式。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情，何新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综合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的经验，应当通过立法保障和分段实施有步骤地规划和推进。他建议全国人大建立专委会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调研，综合评估其利弊，从而从法制上设计一个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和法律确保其建立和实施。在现实中，可以采取分阶段推进，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失业严重、具有不稳定苗头的特殊困难地区先行实施。

（例如，对每年没收和被销毁的大量假冒消费品，可以有选择地选取一些，以实物形式调拨向西部落后地区提供给那些穷苦人口。这总比动员群众捐赠旧物好。针对当前存在的生产过剩状况，国家也可以采取低价收购某些过剩产品，用以配给和救济高度困难地区的失业者的办法。这都是施惠于民的德政。）

何新认为，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国的十几年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自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以来又一个伟大的盛世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学术思想自由，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四方来仪，万国归心。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百年世纪的开端。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在体制的转轨中，近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由于失业和无业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隐忧。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有必要提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上去筹措和认识。

何新认为，江泽民同志近年已多次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

重要性。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社会工程。它与西部开发工程、绿色环保工程可以并列为同等重要和具有伟大开拓性意义的三大工程。实际上，建立这一保障体系乃是关系国家社会持久稳定，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根本大计。

何新认为，真正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体现在国家财税收入的同步增长上，国家应当使这种增长的适当份额，每年有所递增地被用于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上。

以上，就是何新这部新著“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内容。

序

我应当感谢黎明君，在如此酷烈的暑热之际，他不辞辛劳地将若干年来我有关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谈话和论文，整理编纂成此书，作为《思考》的第二卷出版。

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我将原文中的数表和数学模型一概予以删除。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用数学语言表达的东西不能用自然语言作出表述。我希望通过此书能给关心经济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个便桥，使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普遍能够理解和正常思考的学问。

经济理论太重要了。近 20 年来，西方某些战略家通过心理战和经济意识形态的有意识误导，一个一个地由内部瓦解从而摧垮了其对手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态。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在 1950—1990 年的 40 年冷战中，最终“不战而胜”（尼克松语），彻底摧垮了前苏联的国家和军队。靠的是什​​么？主要是经济战和经济意识形态之战。

冷战结束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 90 年代到今天仍在继续。1992 年美国以索罗斯的“民间基金”狙击英镑和里拉，不动声色地巧妙离析本来试图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欧洲货币联盟。1994 年洗劫南美。1997 年发动亚洲金融危机拆解了日元货币圈。1997—1998 年闪击俄罗斯，同时突袭香港、谋划登陆中国，受挫而放出“中国威胁论”。

近 15 年来，世界经济中金融危机频频发作，其后面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自从弗里德曼及所谓“芝加哥学派”以新自由主义与新货币主义理论结合，为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控制扫开意识形态屏障；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国际间的金融战已成为国际资本竞争和利益争夺最引人注目的新形态。

美国自 80 年代中期里根时代以来，经历了里根——布什——克林顿三个时代的所谓“经济复兴”。这种“经济复兴”，就是一年前曾被媒体大力追捧的所谓“新经济”。正如西方一些清醒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新经济并不是实体产业或高科技的奇迹——实际是以美国对全球的金融控制和金融霸权为根基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在一本研究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书中，针对美国新经济的奇迹指出，这一奇迹首先来自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国家优势：

“吸引了全球许多决策者的里根式的‘复兴’，并不是一个真正像联邦德国、日本、韩国引以为荣的那种值得效仿的经济奇迹。美国的玩意儿有点华而不实，因为它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美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财富，即经济的、金融的和技术的遗产，他们可以享用。美国自战争结束以来积累的资本储备是无以伦比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握有巨额股份，1980 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额累计已达 2150 亿美元，1987 年增至 3090 亿美元。1988 年，美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总量是日本直接海外投资的 3 倍。

美国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坐在一座金山上。美国的处境比日本舒适多了，例如，日本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能源，由于人口老化，在其狭窄的国土上，劳动力越来越缺乏。美国在技术资源方面也拥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诺贝尔奖金经常授给美国科学家。‘流脑’（brain drain）每年为美国提供了知识食粮。收入多少不是看资历，而是靠业绩。

文化霸权，它在美国历史上的每次兴衰中都无所不在。这种霸权还在不断强化。对于世界上几十亿人来说，进入现代化就等于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种文化霸权至少依赖三个因素，即语言、大学和媒体。

国际精英们从这些学校中感受到它们的教学质量和学术繁荣。美国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传播它的价值观、它的文化和方法，从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毕业的外国留学生，回国以后自然会变成美国价值观的传播者。

美国几乎垄断了经济学教育。由于这种垄断，以至国际经济文化几乎

除了美国就不知其他。因此，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不为世界上的经济负责人，特别是广大公众所知晓。美国电视或电影直截了当地把它的产业和模式强加给全世界。”

阿尔贝尔还指出，在美国所具有的一切优势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及货币的优势：

“货币优势显示出它的决定性作用。自 1945 年（布林顿森林协议）以来，美元确实成了国际交换的参照货币，也成了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储备的主要货币。由于美元拥有这种极其特殊的地位，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来付款，偿还贷款，为本国开支提供经费。而事实上的美元特权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努埃尔（John Nueller）做了如下直截了当的解释：

‘请你不妨马上设想一下，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接受你用自己的支票来支付。不仅如此，既然使用你们的支票的用户已经遍布全世界，他们没有把支票存入储蓄所，而是当做现金来支付自己的费用。那么，这将对你们的财政本身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如果大家都接受你们的支票，你们就没有必要使用银行发行的钞票了。有一本支票就够了。第二个后果是，你查看你的账单时会惊奇地发现，余款会高于你本人支出的余额。为什么？理由前面已经讲过了，即你开出的支票从来没有被兑换，而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不停地流通。实践的结果是，这将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消费或投资。用你的支票当钱花的人越多，你能够支配的附加资源也就越多……’

努埃尔认为，美国可以支配的资源，比美国纳税人交纳的税赋和美国客户及外国客户认购的美国债券加在一起，大约多出 5000 亿美元，这差不多等于 31 年来美国向第三世界提供的公共援助总额（美国的公共援助每年约 160 亿美元）。

这种货币特权本身直接具有巨大意义。它带来的财政特权——本身也很重要——又可以使其特权翻一番。因此，据估计，每天在美国金融网络中流动的资金总量约为 12000 亿美元。这比法国的年国内总产值还多。可见，美国是依靠金钱——包括它自己的钱和别国的钱——进行统